



《山海经》上古“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构*

王德华

摘要:《山海经》十八篇的篇目及分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山海经》文本叙写结构与内容体现了《山海经》上古“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构。前十三篇两个“天下之中”反映了以“海内昆仑”为中心的神话地理中心向王朝“地中”地理思想的演进,是北方中原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后五篇则是南方族群构建的两个“天下之中”。《海内经》以“帝俊”为首的“天下之中”,反映了部落联合时代以南方巴蜀族群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大荒四经》以血缘缔结的四方地理空间,反映了边缘族群对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族群认同。“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原则,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山海经》上古“天下之中”地理思想南北建构的重要原因。南北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与趋同,体现了南北共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山海经》;天下之中;南北建构;地理观;文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K221.04;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1-0035-10

古代及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山海经》地理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往往都涉及对《山海经》的文本结构的分析。有关《山海经》的篇目,刘秀^①《上〈山海经〉表》云其所见古本《山海经》共三十二篇,他在此基础上厘定了十八篇。由于《山海经》本身文本的复杂性,如后人的羸入、错简的可能,再加上研究者对十八篇成书时间的一己之见,十八篇《山海经》篇目分类出现了任意编排的现象^②。笔者认为,对《山海经》十八篇文本结构的看法,似不应脱离刘秀校定时对十八篇文本所持的态度,那就是刘秀等人所留下的两处校进“款识”:一处是在《海外四经》的最后一篇《海外东经》后,款识为:“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1]315}另一处是在《海内四经》最后一篇《海内东经》后,亦复有同样款

识。款识应是在每一本书校定完结时所题。因而,据《山海经》款识及文本内容,笔者认为:郭璞注十八篇《山海经》分为四个部分:《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四经》四篇、《海内四经》四篇、《大荒四经》四篇、《海内经》一篇。至于《山海经》四类作品的创作时间问题,笔者认同徐旭生的观点,即不能以成书时间代替我们对《山海经》保存的“较近古之传说”的探讨。大体说来,《山海经》反映了上古时代^③的地理观念。

一、《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王朝时代河洛“天下之中”的构建

就《山经》五篇而言,分为五个区域,自成体系,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及《中山经》。其中南山与北山各有三个山系,

收稿日期:2022-09-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JZDZ025)子课题“《尚书》与早期中国‘天下之中’空间史观的建构”。

作者简介:王德华,女,浙江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28),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西山和东山各有四个山系,中山分十二个山系,共二十六个山系。每个山系的叙写都有一定的模式:先写山系首山,并以首山为基准,按照一定的方位叙述每座山的特产物藏、动植物,然后总结山系共有几座山,道里多少,祭祀之礼及所用之物。在相对固定的模式下,叙写方位的不同是《山经》五篇文本结构最大的区别。《山经》中《中山经》所写的地域应是“天下之中”的区域。对于《中山经》十二个山系构成的地域所指,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是若结合《山海经》的文本结构,可以说《中山经》的“天下之中”,应是指河洛地区^④,理由如下。

其一,从“前七经”提到的水道如河、洛、伊、谷来看,这正是西周营建的东都成周地域。《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2] 480-481}《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3]因而,《中山经》一至七经所叙地域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建立的核心区域,当无疑议。

其二,从八经至十二经涉及的巴、蜀及荆楚地域山水来看,先秦尤其是商周以来中原皆视巴、蜀、荆楚为蛮夷之地。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并列在《中山经》中,作为天下之“中”,实为不当。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八至十二经可能出于后人的增益,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后附有明藏经本所校的《山海经》目录,在每卷下都著录了该卷本经、注和今校本经、注的字数。从各卷著录的情况来看,明人所见的古本《山海经》与今本《山海经》经文大都有所增加或略有减少,这说明《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后世增益情况较多,而《中山经》为增益最多的一卷,经文增加了近一半篇幅。二是《中山经》的十二山系,从《中次一经》至《中次七经》七个山系,基本上是东、西两个方向上交替叙写,从《中次八经》开始则变得没有一至七经那么规整。《中山经》八至十二经共五经,或出于巴、蜀,或是战国时楚始强大,由楚人附益,亦未可知。

其三,要真正理解《中山经》在《山海经》中的地位与意义,还必须结合与《山经》一体的《海外四经》才能看得清楚。除了上文所说的“款

识”可以判断这两部分是一体之外,蒙文通主要是通过两部分所载内容绝无重复而论的,袁珂是从“海内”与“海外”的地理区隔,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海外四经》以叙述四方方国为主,兼及山川河流、奇物怪兽。在各经结束时交代该方神祇。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四经》按图画方位述图性质明显,袁珂在《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句下注曰:“《山海经·海外》各经已下文字,意皆是因图以为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仅乃图画之说明。”^{[1] 226}《海外四经》所载海外方国共三十八国,《海外南经》与《海外北经》述图方位相同,都是自西向东;《海外西经》与《海外东经》述图方位相同,皆由南而北。这种整齐划一的述图方式与方国排列,只能是一幅海外方国朝贡的画面,且《山海经》这幅朝贡图的述图文字为《淮南子》所吸纳,只不过在所叙方向及所叙方国上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中山经》所述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中原核心区域、《山经》所述为四方及四方之“中”的海内图景的话,那么,《山经》所呈现出的海内图景,只有放在《海外四经》中,其意义才得以拓展,即呈现出“中心—海内—海外”的天下地理模式。

如果以夏朝作为王朝时代的开始,那么《山经》将二十六山系置入东西南北中五方格局中加以叙写,即是王朝政治地理思想的初步体现。正如研究者们早已指出的,《山经》中的五方观念,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四方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出土了用于测中的“癸表”,而襄汾陶寺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这说明中华文化关于“中”的理念在三代之前就已出现^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容成氏》就有大禹为五方旗以辨方向的记载:“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方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4]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四方及四方风的记载,四方正是和处于中心的“大邑商”相对产生的概念。西周初年对东都洛邑的营建,本身就包含着对天下“地中”的孜孜以求。所以,《山经》中《中山经》以及南北西东四方山经的编排结构,应是夏代以来方位观念及注重“地中”的地理思想在文

献编写上的体现。《中山经》叙写的地域范围是河洛地区,即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三代在这一地区的政权更替,使得民族得以融合,文化得以发展。特别是西周,经过周公对成周的积极营建,成王在成周落成之际,大会诸侯与四方方国于成周的政治举措,促进了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朝地理中心是以都城为天下“地中”的,围绕这个中心的是四方诸侯和方国。《五藏山经》中,围绕《中山经》的是南山、西山、北山与东山四经,之后排列的文本是《海外四经》。正如上文所说,《海外四经》是方国职责的述图文字。郭璞、毕沅、郝懿行在注释《海外四经》时,各家时常引《逸周书·王会解》,这说明《五藏山经》及《海外四经》与《王会解》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除了二者均是述图之作外,《海外四经》中许多条目直接与《王会解》相关。安京《〈山海经〉新考》言:“《海外》四经是描述海外居民‘方位’的,根据统计,‘海外’四经共有条目85条(以袁珂先生注释本为准),其中与《王会篇》相关的条目达41条,大致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中不少条目是直接对应的。”^[5]揭示了二者更加隐秘的关联。《逸周书·王会解》的意义不仅在于“成周之会”,即诸侯四海方国朝会成王;更在于作为地中的洛邑始成,周公致政成王,成王大会诸侯于“天下之中”,形成地缘政治。详载山川道里、神怪之物的《山经》和反映“海外四方的职责”的《海外四经》,与《王会解》相较,二者虽有差异,但相同之处也非常明显,均反映了王朝政治地理与朝贡体系的建立。《山经》以《中山经》为中心,与《南山三经》《西山四经》《北山三经》《东山四经》共同构成王朝“海内”地域,以《海外四经》表示四方四维之国朝贡成周的图景,典型地反映了夏商周三代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天下之中地理思想的确立。

《海外南经》开篇载:“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1]225}也就是说,《山海经》中对二十六山系所作的详细记载,正如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所说的“禹别九州,任土作

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1]540},即《山海经》是“禹益”“类物善恶”而成。尤其是《山经》五篇,在没有人的山系丛林中,对于鬼怪神灵、异物吉凶的认知以及对神灵异物的祭祀,就是圣人知物与德性的充分体现,是对九州大地的充分治理与秩序建立的形象说明。因而,在制度层面上,周代设立了管理山林之官。《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6]从制度层面也可以印证,《山经》对山川道里的计算,典型地反映了王朝时代人们对天下地理的认知、掌握与管理。《山经》结尾处“禹曰”^{[1]220-221}一段话也有道明此意的目的。虽然“禹曰”一段话极有可能是秦汉时人所加,但却说出了《山经》叙写的实际目的,即经纶国用的政治与经济目的。而东都成周的建成,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而言,与各方道里均等的进贡制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其地为天下之中,即处于地中的位置,不仅反映了王朝时代对“地中”追求的地理思想,而且其中包含着天赋王权的政权合法性的积极构建。

二、《海内四经》:古国时代 “天下之中”昆仑的构建

《海内四经》存在较为严重的错简、后代增益等问题,面对这一相对独立而又复杂的文本,我们如何认知《海内四经》的“海内”?笔者以为,此“海内”,指的是“天下”。“天下”即天之下,当后来的人间君王成为“天子”之后,此“天下”变成“海内”的同义语,所以,先秦典籍中有以“天下”指“海内”,或以“海内”指“天下”之例者。而《山海经》中的“昆仑”实是“帝之下都”,那么在世人眼中,以“海内”代指帝王的“天下”也就在义理之中了。《山海经》叙写这样一个“天下”,以“帝之下都”的昆仑作为中心,也是情理中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海内西经》中“海内昆仑之虚”这种叙写方式,其中“海内”二字具有揭示叙写核心的作用。郭璞注曰:“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1]345}在《山海经》中昆仑作为

被描述的主体对象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名字被提起,主要是在《西次三经》《海外南经》及《大荒西经》中。郭璞所言的“海外复有昆仑山”应指《海外南经》中的昆仑虚。此外,具有神话政治地理意义的昆仑,其大致方向在西北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海内西经》中的“海内昆仑之虚”的“海内”二字,一方面表明这里叙述的昆仑——正如《海内四经》每篇篇首均以“海内”发端一样——具有重要的叙经方位的提示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这部分叙写的中心正是“帝之下都”——昆仑。

其次,我们以袁珂《山海经校注》为本,将《海内西经》以序号标识,《海内西经》共23条,从第13条至第23条共11个条目,约占一半的篇幅是对“帝之下都”——昆仑的叙写:

13.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1]344-345}

14.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

15.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16.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1]348}

17.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18.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19.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20.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馘。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1]349-351}

21.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窳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1]352}

22.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1]353}

23.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雉、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鶡、视肉。^{[1]354-355}

《海内西经》开篇一句“海内西南隅以北者”,此下经文,按照惯例,第13—23条应该采用昆仑山“又西”或“又北”或“又西北”这样的方位来叙述,而事实上,这里却是占用了《海内西经》一半篇幅,采用整体四方的叙写手法,对昆仑山区域进行叙写。从叙述结构看,首先叙写了昆仑的主要区域(第13条),即作为“帝之下都”的“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长五寻,大五围”的木禾,面有九井与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然后以此为中心,按照四个方向叙写了昆仑山上的几条重要的河流(第14、15、16、17条):“赤水出东南隅”“河水出东北隅”“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弱水、青水出西南隅”。接下来写昆仑之南的南渊,南渊南有开明兽,并以“开明兽”为中心写了开明兽四方即“开明西”“开明北”“开明东”“开明南”的神物。可见,这种以一个视点为中心然后向四方叙写的整体视角,不同于《山海经》其他经中叙写昆仑的方法。如《西次三经》中的“昆仑”夹在“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1]53}与“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1]58}之间,作为叙列中的一山加以叙写,虽然本身描写也比较细致,但是方位感不够突出,而且对山上仙草植物都叙写了实际的功用,如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渴”,“藿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1]56},与其他山系的叙写并无二致。其中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四水虽也有大致的方位,但远不如《海内西经》中位于八方四隅那样整饬。因而,《海内西经》以其中11条占一半的篇幅揭示了《海内四经》是以昆仑作为叙写中心的。

最后,将“海内昆仑”看作《海内四经》的叙写中心,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海内西经》中第13—23条占一半篇幅的“海内昆仑”在全经的中心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海内四经》“错简”“增益”乃至“错解”等诸多问题。从《海内四经》看,既然《海内四经》的中心是昆仑,那么《海内四经》中的有关“在昆仑北”“昆仑东北”“昆仑东南”这样的方位提示,均透露出以昆仑为中心的四方叙述。此外,一些地理明晰、尤其是秦汉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南西北的地理与地名的叙

写,应视作后人的添加。这也是《海内四经》错简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⑥。

与《五藏山经》《海外四经》九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海内四经》,大致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前的古国时代的地理观,即以昆仑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地理观念。昆仑之所以能成为北方华夏族神权政治地理的中心,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从《海内西经》“海内昆仑”所载的传说人物来看,首先是黄帝。《海内西经》载:“貳负之臣曰危,危与貳负杀窳麻。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在开题西北。”^{[1]335}袁珂认为此“帝”是指黄帝,“郝懿行谓‘李善注张协《七命》引此经作黄帝,黄字衍’,黄字其实不衍,此‘帝’正是黄帝。疏属山附近之开题,毕沅说‘疑即笄头’,笄头又即鸡头,《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西至崆峒,登鸡头’语,可见鸡头(开题)附近,为黄帝神话所及之地”^{[1]336}。另外就是后稷,他在昆仑山留下的遗迹,《海内西经》有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氏国西。”^{[1]341}可见,《海内西经》突出的是黄帝和周之始祖后稷,这正是华夏族姬姓的重要代表。立于昆仑山上的开明兽,守昆仑九门,“非仁圣莫能上冈之岩”,突显了这座山的神圣性。关于“仁圣”之“圣”一本作“羿”,即“仁羿”。袁珂虽然首推应作“仁羿”,但他认为“仁圣”亦通:“‘非仁圣莫能上冈之岩’,犹《海外西经》称‘龙鱼陵居在其北,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无非对古有才德者之赞美而已。”^{[1]347}若我们把“帝之下都”的神圣性看作古国时代政治神权的一种象征,则此“仁圣”并非仅是“对古有才德者之赞美而已”,而是突出了昆仑作为“帝之下都”的人间权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虽然在三代“地中”思想追求中,《山海经》中的昆仑在政治实践层面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其影响并未消失。关于昆仑三层结构,《尔雅·释丘》曰:“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郭璞注曰:“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7]《离骚》中屈原在向重华陈辞后,“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所游昆仑也是由三层构成的。《淮南子·墜形训》载之较详:“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

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8]328}太帝即天帝,其实就意味着昆仑是作为与“太帝之居”相对应的地下的权力中心。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成王会诸侯的礼仪场所——“”,就是对昆仑三层结构的模仿,“根据《王会篇》,的四周是有营墙的。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中往往有坛,即用夯筑泥土或垒砌石料的方法建造的高出地面的‘台’。《王会篇》中提到,在中,台分内台、中台和外台。如何划分内、中、外?似应以高度来划分,即内台高于中台,中台又高于外台,外台则高于地面。在古代传说中,三层的台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昆仑’”^[9]。由此,我们不仅看到《王会解》与《山经》及《海外四经》之间所体现的地理思想的相似,而且看到了《王会解》的礼仪场所“”与“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间的结构关联,这种关联揭示了中国上古地理思想从神话向人文的内在转换。正是昆仑为“天下之中”的神权政治地理,在“天下之中”由神话转身人文时依然发挥着它固有的作用,使得昆仑的神权政治地理中心在后世得到传播。汉代纬书如《尚书纬》、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地理书如《水经》《山海经图赞》,都记载着昆仑与居天之中的“北极”相对,故而具有“帝之下都”“地中”“地首”“天柱”的重要地位,反映了《海内西经》中“海内昆仑”对后世的影响。正是在政治与权力中心的象征与运作上,《海内四经》以“昆仑”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地理思想与前九篇王朝“地中”的地理思想在本质上达成了一致。从“昆仑”到“地中”,也反映了古国时代神权政治地理向人文地理的转向。

三、《大荒四经》《海内经》:南方上古两个“天下之中”的构建

《山海经》中“皆逸在外”的后五篇——《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在十八篇中是以“附属”的性质排列在《五藏山经》《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十三篇之后的。至于后五篇是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文本,则需要我们对文本作具体的分析。

《大荒四经》只有东、西、南、北四荒叙写,不

像《五藏山经》中有一明显的中心即《中山经》。《大荒四经》与《海内经》也不像《海外四经》与《五藏山经》那样,共同构成“地中—海内—海外”的王朝天下图景。蒙文通将《海内经》视作《大荒四经》中的一篇,认为《海内经》的中心也就是《大荒四经》的中心。但是仔细分析《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的文本叙写结构,可以说《大荒四经》与《海内经》有着各自不同的“天下之中”。

首先,我们来分析《大荒四经》四方叙写结构所呈现的地理中心。《大荒四经》东西南北四方的叙写结构,其实就暗含一个四方的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地域究竟何在,《大荒四经》并没有明言,但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大致确定《大荒四经》的中心所指。其一,从所载内容来看,《大荒四经》叙写内容与前三篇中的《海外四经》有着相同之处,而其最显著莫过于其中对各方方国的记载。《大荒四经》所述四方方国,绝大多数亦见之于《海外四经》。若将《大荒四经》与《海外四经》《五藏山经》进行比较,从其叙写的重合之处,即能够辨别出《大荒四经》四方包围的中心的中心的大致地理范围。其二,除方国外,有两处值得提出:一处是《大荒南经》所言舜葬苍梧之地:“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1]420}以舜葬处作为参照点,此地是《大荒南经》中为南荒之地。另一处是昆仑,《大荒西经》中有昆仑之丘,《西次三经》中也有昆仑,以昆仑作为参照点,可知昆仑在《大荒四经》属大荒之地,在《西次三经》中则明显属于海内。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大荒四经》记载的荆楚、西南巴蜀以及西北昆仑区域等地大都属于荒外之地,不在《大荒四经》四方呈现的“海内”范围之中。对《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范围的大致界定意义有二:一是《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虽然小于《五藏山经》的“海内”地域范围,但是“天下之中”是在河洛地区则无疑;二是南方荆楚之地与西南巴蜀之地不在“海内”范围之中,这为我们探讨《大荒四经》产生于南方地域提供了便利。

上文业已指出,《海内四经》四篇是以昆仑为中心的四方叙写,那么,与《海内四经》相较,列于《大荒四经》后的一篇《海内经》,此“海内”又是何指呢?如果《海内经》叙写的内容也称作

“海内”的话,那么,此“海内”的中心即是它叙写的中心。在《海内经》中,“东海之内”最为简略,只有一条。“南海之内”和“西海之内”记载丰富,占大部分篇幅,并且集中在今西南与西北部地区,这一区域也就是《海内四经》的昆仑区域。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海内经》中的“西海之内”的叙写中,竟然没有“昆仑”。对于“昆仑”这座名山在《海内经》中的缺位,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在《海内经》的“海内”图景中,作为“帝之下都”的“海内昆仑”并不在叙写的视野之中,昆仑只是到了《大荒西经》中才出现,叙写也较简略,只是作为《大荒西经》中的一座山加以叙述,对于其神,只说了外在特征,即“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与《海内西经》所说的开明兽相似。到了《海内四经》中,昆仑才成为“帝之下都”,并成为“海内”的中心。在《西次三经》中虽然也被视作“帝之下都”,但其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已悄然被《中山经》的核心区域——“地中”所替代了。

但是,《海内经》中虽然没有昆仑这座山,却有《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次三经》所载录的昆仑区域中的一些标志性的神木如建木,以及水道如弱水等的叙写。比如建木:“有九丘,以水络之……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橰,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暉爰过,黄帝所为。”^{[1]509}同时在《海内经》中也有“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1]505}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10]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1]506}郝懿行根据王逸注《楚辞》引“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经文,今脱去之,而误入郭注也”,并指出郭璞注“天下之中”应依王逸注为“天地之中”^[11]。笔者认为郭璞的“天下之中”较适合神话原义,即表明此“都广之野”是天帝的“天下之中”;而天地之中,则不仅是天中也是地中。从《海内经》对都广之野的叙写来看,主要突出了都广之野动植物的神性和祥瑞特征。《淮南子·墜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8]328-329}可以认为,“都广之野”正是《海内经》中的“天下之中”。

由此可见,《大荒四经》与《海内经》,其“大荒”与“海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关联的地理单元,即单纯地理上的指称;二者之间也并不构成四方“大荒”与中心“海内”的关系,而是分别反映了以“四荒”所呈现的中原地域中心和以“都广之野”为中心的两个“天下之中”。

如果说前十三篇是北方对上古时代“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那么后五篇则反映了南方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蒙文通对上古的族群融合与地域分布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精到的见解,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叙写的传说核心人物帝俊以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创造发明者,与中原古史传说系统《世本》《汲冢竹书》《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有别,说明《山海经》产生于巴蜀、荆楚。但是他未能注意到其所列出的帝俊及发明者完全出自后五篇,尤其是作为天神与人祖的帝俊不仅未出现在北方古史系统之中,也未出现在《山海经》的前十三篇中。如果从文本叙写的人物角度进行比较,我们只能说《山海经》的后五篇出自南方巴蜀、荆楚。

当然,认为《大荒四经》《海内经》五篇为南方地域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后五篇反映了南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及地理观的演变。从《海内经》叙写的神话传说人物与文本叙写结构来看,《海内经》的人物叙写方式,并不是以方位加以安排的。《海内经》在按照方位即东海之内、西海之内、南海之内、北海之内叙写“海内”之后,集中叙写了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及其后裔,太皞是在叙写巴国历史时出现的,虽然游离于群帝及其谱系的叙写之外,但是性质却等同。所以,若加上太皞,则具有谱系的群帝包括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及太皞,除帝俊外,其余四帝与北方古史系统中以方位划分的五帝系统多有重合。从这一角度来看,笔者比较倾向于徐旭生的观点,即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太皞属于五个较大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在《海内经》中以相同的身份被叙写,说明《海内经》中作为“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是南方巴蜀人以自己部族所在为地理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叙事文本所指涉的是古国时代部族融合的历史及地理思想。

除了众帝外,还有作为众帝之裔的发明者。这些发明者,与《世本·作篇》所载的“作者”即众多发明者绝无雷同。对于这种现象,蒙文通认为是南北地域不同造成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若进一步比较《海内经》与《世本》关于“作者”的叙述,则可发现有两点不同:一是《海内经》中的“作者”,虽有姓名,却是作为众帝后裔、在众帝的谱系中叙述的;二是在帝俊、炎帝、少皞、太皞、黄帝的谱系中,唯独黄帝、太皞的后裔没有“作者”的交代;而《世本》中的“作者”,据汉宋衷注大都为黄帝臣。这种明显的不同,说明在《海内经》中帝俊最为重要,因为他的后裔“作者”最多。这也说明作为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正是以帝俊为首的众帝的“天下之中”,文本指涉的正是僻处西南的巴蜀以自身族群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置于众帝谱系中的“作者”,反映了南方边缘族群对帝俊的推崇以及对其他帝系族源的尊重。

其次,我们梳理《大荒四经》叙写的众帝之裔在四方建立的方国。《世本·居篇》是对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的居地及迁徙情况的记录,上古时代帝王居地主要在中原一带。如果我们将《大荒四经》与之相较,则可发现《大荒四经》的方国除了一些没有谱系的方国外,大都是古帝之后裔所建,涉及的古帝有帝俊、颛顼、黄帝、少皞,其中颛顼出现十次,帝俊出现七次,黄帝与少皞各三次,炎帝一次。与此相应的是众帝后裔及其分布于四方的情况:帝俊后裔多在东方,南方次之;颛顼后裔以北方为多,南方、西方次之;黄帝后裔主要分布在西方与北方;炎帝后裔主要在北方;少皞后裔则除东方外,其他三方各有一裔国。由于帝俊与羲和、常羲化生日月的神话,故而帝俊在《大荒四经》中地位颇高。就四方方国来看,帝俊后裔之国也最为显著,“黍食,使四鸟”是他们的标志。徐旭生认为四鸟是帝俊族群四个氏族的图腾标志。颛顼之裔国也大都食黍,有的也“使四鸟”。从这方面看,颛顼与帝俊有着某种相承性。《大荒四经》中两次提到颛顼生老童,据《世本》老童为楚先,屈原《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自称是颛顼帝的后裔,确有所本。应该说在《大荒四经》中的古帝,除了帝俊就是颛顼,从帝俊是楚地创世神话的

重要人物之一^①、颛顼又为楚人的祖先来看,《大荒四经》或许如袁珂所说为楚人所作。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帝俊作为族群先祖,他的族群属性发生了明显变化。《海内经》中帝俊与黄帝、太皞、少皞、炎帝没有血缘关系,而在《大荒西经》中,帝俊却与华夏集团中的四姓(姜、销、姬、姚)产生了关系,所以徐旭生认为:“姜、姬、姚均属华夏集团,姜、姬二姓又为炎黄二帝的宗姓。销姓出于帝鸿,帝鸿实在就是帝江,又见于《山经》中《西次三经》,那也当属于西北方的华夏族,所以说帝俊的传说出于华夏集团,可以说没有疑义。”^[12]帝俊族群身份的明显变化,说明边缘族群对自身族群祖先中心化具有一定要求。这与上文所说的《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以及海内“天下之中”所指涉的中原区域也是一致的。《大荒四经》亦如同《海内经》一样,是边缘族群通过“大荒”四方的叙写,建构了以众帝为中心的四方地理空间与社会组织形态。这一空间结构与组织形态,反映了上古王朝时代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族群的认同,也反映了边缘族群对其中心族群后裔身份的强调。

四、“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原则与“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构

《山海经》的文本结构揭示了《山海经》的篇数、分类不是编纂者主观随意的安排,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与文本的架构。文本的叙写结构与南北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密不可分,体现了“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结构原则。所谓“事类相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外在的文本风格与内在的文本内容,即表现的“事”相“类”;二是指文本所述之“事”之间核心内容上的相类。这种“事类相附”的原则,即是《山海经》呈现出的文本结构的核心因素,使《山海经》的外在文本结构与内在叙写结构的意图一致。《山海经》按照《五藏山经》与《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海内经》四组十八篇的编排,反映了南北对“天下之中”的建构与地理思想演进的轨迹。

“事类相附”编纂原则在先秦典籍中并不鲜见,《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有体现。《王会解》在正文王会诸侯之后有两个附录。一是《禹四海

异物》,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在《王会解》叙写四方四维诸侯方国之后,有校语云:“以上与下‘伊尹朝献商书’之间,王应麟本有题为《禹四海异物》者一节,并标明郑氏玄注。何秋涛《笺释》亦有之,今一并附录于左。”^{[2]899}从所附二文来看,非常简短,其内容是写禹时“四海异物”“咸会于中国”。二是《伊尹朝献》,“《伊尹朝献·商书》,不《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孔晁注云:“言别有此书也。《王会》期朝贡事,故令附合。”^{[2]908-909}《伊尹朝献》的核心思想,即朝献贡物只宜献己国所有,不应劳民致他物于远方,这反映了朝会贡物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圣人以德致物,四方来献,天下毕贺的政治愿景。假如《王会解》中只有“王会”的场景,而没有此两篇的附录,那么,《王会解》的意义则不甚明显。正是这“事类相附”的两篇,才使《王会解》的核心要义得以凸显。同样,《禹贡》也是如此。世人研究《禹贡》,均疑《禹贡》叙九州后,为何还附有“五服”。如果说《禹贡》更多地侧重以自然山川划分九州,以导山导川为主,那么“五服”则以一种相对可以计算的标准说明人类社会空间的等级差异;如果说九州区划强调自然道里的远近与贡物多寡轻重之间的关系,那么,“五服”则也体现了社会组织内部远近亲疏关系与贡献的不同,这也许就是王道政治在《禹贡》中的体现。故撰述《禹贡》者把这两篇有着政治与地理形态关联的文献,以“事类相附”的方式合在一起,自有深意。此外,《汉书·地理志》在叙述汉代的行政区划前,即录《禹贡》一篇,只不过《禹贡》为经典,故附于前,示尊经之意。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在志末又辑录了西汉成帝时刘向所言的‘域分’,朱贡所条的‘风俗’;所谓域分、风俗,实际上是一篇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而予以补充、扩展、改编,比《货殖列传》更加完备的全国区域地理总论。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大多数根本没有这一部分,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类似的记载,但远不及汉志的全面而扼要”^[13]。这种“事类相附”的编纂原则,我们就《隋书·经籍志》“地理类”下的一段话来看,可能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撰述地理文献的方式。

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

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14]

《隋志》所说的“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所谓“因之”,就是以“事类相附”的编纂原则,在后面附上刘向的“域分”与朱贡的“风俗”,这样,不仅使《汉书·地理志》呈现出“事类相附”的文本结构,而且使《汉书·地理志》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古代历史地理文献。班固之后,在南朝,“事类相附”可能还是编写地理书的一种主要方法,如《隋书》中提到的陆澄的《地理书》、任昉的《地记》、顾野王的《輿地志》、隋代《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都是卷帙浩繁的地理书,在编排上或许附有前代的地理撰述,亦未可知。总之,《山海经》“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原则,使得《山海经》成为神话之渊薮,也使《山海经》保留了丰富的上古地理思想资料。

此外,“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原则使得《山海经》前十三篇与后五篇前后贯通,并在历史发展脉络与地域的区隔中,演绎着南北对“天下之中”的建构、追求与认同,反映了上古“天下之中”地理思想的人文内涵。《山海经》前十三篇所反映的内容是王朝时代国家地理中心与前王朝时代以黄帝为中心的昆仑神权地理中心,从“昆

仑”到“地中”反映了北方地域从五帝到三王这一历史阶段“天下之中”的地理演变,伴随着这一演变的是西北华夏族向东的不断迁徙以及华夏民族在“天下之中”地理建构上的人文转向。《山海经》后五篇之《海内经》反映了南方边缘族群以自身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构想;《大荒四经》则是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族群的认同,以血缘拉近与中心族群之间的关系,抑或以身份的一致,表现对处于北方中心地域华夏族群的认同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天下之中”的建构,不仅关乎地理,而且反映了上古华夏族在族群融合中所形成的核心凝聚力。南北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与趋同,体现了南北共有的“天人合一”的政治与文化心理结构,对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具有深刻的启示。

注释

- ①即刘歆,因避汉哀帝刘欣讳改名为刘秀。②详见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新兴书局1965年版;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华书局2019年版;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载《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③古史研究中所说的“上古时代”,一般是指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传说时代。本文因表述的需要,采用了“上古时代”这一历史概念,指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的传说时代。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时代称为“古国时代”,夏商周三代,本文称为“王朝时代”。④详见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全集》第二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122页;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431页。⑤参见何弩:《尧都何在?——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史志学刊》2015年第2期,第1-6页;刘庆柱:《“中”与“中和”理念的考古学阐释》,《从考古看中国》,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21-132页。⑥《山海经》中《海内四经》的错简现象尤为突出,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卷六就有所论述,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33-334页。⑦具体参见董楚平:《中国上古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修订

-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27.
- [4]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5-266.
- [5]安京.《山海经》新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3.
- [6]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02.
- [7]阮元.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16.
- [8]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9]安京.《山海经》与《逸周书·王会篇》比较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4):92.
- [10]杨慎.山海经补注[M].百子全书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222.
- [11]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54.
- [1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73.
- [13]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M]//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55.
- [14]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88.

The North-South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 in *Shan-hai Jing* (《山海经》)

Wang Dehua

Abstract: The conten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eighteen chapters of *Shan-hai Jing*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logic.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text narrative of *Shan-hai Jing* reflects the north-south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天下之中). In the first thirteen chapters, the two “centres of the world” reflect the evolution from the mythological geographical center centered on “Hainei Kunlun”(海内昆仑) to the dynasty’s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centre of the earth(地中)”, which is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 by the northern central plains. In the latter five chapters, the two “centres of the world” are constructed by the southern ethnic groups.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ed by “Emperor Jun(帝俊)” in “*Hainei Jing*”(《海内经》) reflects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 centered on self clan in the era of tribal union; The four-direction geographical space of the “*Four Classics of the Great Wilderness*”(《大荒四经》) formed by blood relationship reflects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marginal ethnic groups centered on the Huaxia ethnic group. The principle of text compilation of “things are attached to each other”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we can still see the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the north-south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 in *Shan-hai Jing* today.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owards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centre of the world” reflects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unity of human and heaven shared by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hich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Chinese state.

Key words: *Shan-hai Jing*; centre of the world; the north-south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ion of geography; text structure

[责任编辑/启 轩]